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4.002

毛泽东反思“左”倾错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辉¹,谭诗杰²

(1.暨南大学 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反思、总结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教条主义严重错误的教训,在革命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历程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批评、反思和总结“左”倾错误的主观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反思和总结在革命道路上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错误,创造性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反思和总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排斥中间阶层的“左”倾错误,形成了争取大多数同盟军的统战理论;批评和反思在组织问题上宗派主义的“左”倾错误,形成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毛泽东;民主革命;“左”倾错误;党史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4-0008-08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①等三次严重的全局性“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点都是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神圣化苏共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从整体上没有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毛泽东认为,这些“左”的错误的发生,是由于“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②,因而难以避免。在党内“左”倾错误发生之时,毛泽东率先抵制、批评、反思和总结在思想路线、革命道路、统一战线和处理党内矛盾等方面的“左”倾错误并在实践上力所能及地矫正“左”倾错误。可见,毛泽东对党史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进行再认识,从而在实践的基础上促使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化认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 反思和总结在思想路线上的“左”倾主观主义错误,形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盛行着“本本主义”与“教条主义”思想,先后出现三次“左”倾错误,而

且一次比一次严重,革命损失也更大。究其根源,在于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没有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认识问题,没有从思想根源上找到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不仅批评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左”错误并在实践中纠正其错误,更为重要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进行反思性认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第一,土地革命时期批评、反思和总结“左”倾盲动错误和立三路线的“左”倾冒险错误,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八七会议后,党内由于共产国际“左”倾理论的错误指导,发生了盲目暴动的“左”倾错误,“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③。这次盲动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其领导人机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不承认中

收稿日期:2020-01-20

基金项目: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果(JDNJL202006)

作者简介:熊辉(1971—),男,湖南常德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目录第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7页。

国革命的不平衡性”^①,企图通过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方式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结果造成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对这两次“左”倾错误,毛泽东不仅在革命实践上力所能及地减少这两次“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从思想根源上批评、反思和总结这两次“左”倾的错误发生的思想根源。毛泽东认为,这两次“左”倾的错误究其思想根源在于盲目迷信共产国际指示,没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中国国情,主观脱离客观。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国际和苏共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党内“左”倾领导人机械理解马列“本本”,不加分析地盲目遵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和苏共的革命经验。为此,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从思想建党原则的高度,提出了在红四军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盲动等错误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②。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③,在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公开尖锐批评教条主义者,他指出,教条主义以为“‘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④。这种完全依靠书本知识而忽视中国国情来指导革命斗争是十分危险的。为了克服本本主义错误,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⑤,进而强调正确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⑥。可见,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分析批判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的唯心实质,强调中国独特而复杂的革命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开创新局面。这就初步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标志着毛泽东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探索。

第二,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评、反思和总结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及以往的“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结束后,由于当时的党中央都未能着重从思想路线高度彻底认识前两次“左”倾错误并深刻总结其教训,导致后来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第三次“左”倾错误“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⑦。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由于尚在长征途中,还没有条件在全党彻底从思想上对其进行清算。在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有条件着重从思想上批评、反思和总结第三次“左”倾错误。1936年底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紧紧抓住“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一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问题,严厉批判了照抄苏联红军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指教条主义者——笔者注)恰是忘记了这一点”^⑧。毛泽东在该文中结合土地革命时期军事斗争存在的“左”倾错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他着重指出,王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找到中国军事斗争的规律,没有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阐发符合中国实际的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7月毛泽东写了哲学论文《实践论》,从哲学上批判、反思和破除教条主义。“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⑨,毛泽东在该文中反思和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并深刻分析“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⑩。该文批评了“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⑪的认识论的根源,阐述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同年8月,毛泽东“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注释。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注释。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注释。

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①《矛盾论》,全面阐述了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着重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结合批判“左”倾错误,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②,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③。在这两篇哲学论文中毛泽东通过批判和总结三次“左”倾错误,从哲学的高度深刻、系统地论证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认识根源,为党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教条到理论自觉,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联系党的历史回顾和反思党的“左”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教训来破除主观主义,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他在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结合对历史上“左”倾错误深刻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先后开了五次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党的历史上“左”倾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间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⑤此外,毛泽东还在延安整风期间作的《反对党八股》报告中,把教条主义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任务。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⑥错误,特别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内涵和实质的精辟论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二 反思和总结在革命道路上的“左”倾城市中心论错误,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错误就是在中国革命道路上不顾中国国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革命的理论,教条地对待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经验,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结果“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⑦,造成城市工作失败、乡村工作绝大部分也失败的后果。善于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批评、反思了城市中心论的“左”倾错误,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第一,毛泽东批评了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左”倾错误,阐述了城市中心论必然失败的原因^⑧。由于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在探索的过程中,犯过三次“城市中心论”的严重“左”倾错误。在革命道路上的“左”倾错误遭到了毛泽东在实践工作中的坚决抵制和批评,并且毛泽东阐述了为什么城市中心论是错误的。在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⑨,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夺取和占领城市,形成“左”倾的盲动主义路线,导致宝贵的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但是,“左”倾的盲动主义错误结束后并没有肃清其思想根源,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随着时局的发展又演变为第二次“左”倾错误,即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⑩,同样使党和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王明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又继续重复前二次“左”倾错误,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注释。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页。

首先胜利”^①的错误路线。“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②为什么城市中心论在中国革命中必然失败?毛泽东反思在革命道路和军事斗争问题上各次“左”倾错误,指出了其必然失败的原因在于:各次“左”倾路线缺乏对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等方面的了解,只是机械套用俄国革命道路的经验。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指出:“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④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入总结和分析了城市中心论的“左”错误,进一步指出这种错误是“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城市中心论”失败的原因进一步作了深刻分析和总结,“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⑥,而总是梦想“通过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⑦。总而言之,“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和以农村为中心进行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最终导致

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挫折。

第二,毛泽东批评和总结“左”倾“城市中心论”的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原因。毛泽东认为,犯“左”倾“城市中心论”的错误在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⑧,不顾国情套用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革命经验。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批评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⑨,正因为如此,“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⑩。究其原因,正如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地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⑪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了“左”倾在革命道路上的错误后作了进一步阐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⑫中国的农村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存在下去,毛泽东对此总结道:“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⑬造成了中国特殊国情下的乡村中心革命道路的必然性。毛泽东正是批评和总结了“左”倾在革命道路和军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注释。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18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5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5页。

事斗争上的错误,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点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创新性地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革命道路。

三 反思和总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排斥中间阶层错误,形成了争取大多数同盟军的统战理论

土地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都未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精髓,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导致在建立工农联盟、处理资产阶级关系的统战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批评、反思和总结“左”倾路线在统战理论和统战实际工作上的错误,准确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形成了争取大多数同盟军的统战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

第一,毛泽东批评和反思“左”倾错误在处理富农问题上的错误,形成了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的统战思想。中国革命实际是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党领导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反思和总结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农村富农问题上的错误政策。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评了“左”倾在工农联盟上的错误政策,“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①方针是统一战线的机会主义策略。1940年底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反思过去“左”倾土地政策时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这些许多过左的政策,“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②。针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在1941年9月的讲话《关于农村调查》中批评过去“左”倾政策时指出:“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

立。”^③毛泽东主持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批评和总结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富农的错误政策。该决议指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准确把握,主张打击富农,甚至对地主富农赶尽杀绝,指责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④。虽然“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也主张给农民分配土地,但由于基于“左”倾错误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⑤,导致革命受到严重挫折。该决议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⑥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与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为了团结和领导广大农民,“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⑦。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包括富农在内的广大农民,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第二,毛泽东批评和反思在处理资产阶级关系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团结和建立同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统一战线思想。什么是统一战线上的“左”倾关门主义?毛泽东指出:“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⑧中国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包含多个阶级阶层和团体,其成员随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他们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既有利益妥协也有严重的矛盾冲突,其关系也会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1-97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不断变化,同时他们对中国革命存在支持和同情一面。这需要党的领导者实事求是地分析其状况,并采取恰当的方式与之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左”倾特别是王明等完全忽略了中间阶级的力量甚至采取了排斥和敌对的态度。毛泽东对“左”倾在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错误,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和纠正,而且站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角度,进行了批判、反思和总结。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批评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①,讽刺批评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搞纯粹而纯粹的阵线:“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因此,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②。针对“左”倾关门主义错误,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问题,严厉地批评了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还继续存有“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人,“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③。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业已建立的情况下,党内仍然要“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强调了“反对‘左’的急性病”^④。《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和总结了“左”倾在处理同中间阶级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该决议认为,“左”倾共性就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⑤,错误的根源在于将矛盾的性质和矛盾的尖锐程度混淆,既否定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可能又否定了争取中间阶级力量的可能。盲动主义者在统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⑥,主张所谓“不断革命”错误理论。李立三

“左”倾路线“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⑦。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⑧,将民族资产阶级置于反革命的队伍之中,要求坚决斗争“中间势力”,结果,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革命阶级,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抗战以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民族革命战略的转变,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束缚,最终建立了联合各阶级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 反思和总结组织问题上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形成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政党内部都会有矛盾,任何政党的发展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三次“左”倾错误都在组织上出现了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⑨。对此,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非对抗性矛盾的视角来认识和处理党内出现的严重矛盾和分歧,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和批评了党内这种“左”倾错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纠正,并且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度深刻反思、总结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处理党内矛盾的严重错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来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的正确思想。

首先,毛泽东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组织上宗派主义的“左”倾错误。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推行“左”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注释。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3页。

倾盲动主义错误政策,“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①。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制定和推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执行这些错误计划的过程中,……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②。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逐渐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强制推行“左”倾的“进攻路线”扫清障碍,王明中央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残酷的党内斗争,一大批实事求是的党的领导人被戴上各类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③。毛泽东十分清楚“左”倾错误在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多次抵制和批评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的严重错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对此曾批评到:在“左”倾错误占主导地位时,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④。为吸取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在该文中论述干部政策时提出:“左”倾教条主义者“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⑤毛泽东认为,在处理党内不同意见时动辄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在1941年的一次讲话《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批评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⑥1942年2月,毛泽东

又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在分析了党内存在的党八股的罪状后,总结说,以前“左”倾错误在组织上实施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⑦。根据这一宗旨和方针,在开展党内斗争以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必须坚决反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根除“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详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总结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组织上的严重错误,“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⑧,这严重恶化了那个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态,甚至造成人人自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⑨毛泽东批评和坚决抵制了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仅将各次“左”倾错误给实际工作的影响和损失降至最小,而且在理论上反思和总结了各次“左”倾错误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等,提出了一整套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处理党内矛盾的思想。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思想。在分析和总结了“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后,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从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卸掉思想包袱,团结犯错误的人一起前进。正是基于此种认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要求,“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不能采取“残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528页。

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对待历史上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1942年2月,他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①这一方针是在总结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对待党内犯的错误一定要不讲情面地揭发,但揭发的目的是为了治病,为了克服缺点,就像医生治病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因此,他指出,延安整风运动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他强调:“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

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和总结了历史上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后指出:“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③如果批评的对象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有强烈的团结他的愿望,党内矛盾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多次批评、反思和总结组织上的“左”倾错误,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思想。

Mao Zedong's Reflections on the Leftism Errors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XIONG Hui¹ & TAN Shi-jie²

(1.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hesivenes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o Zedong Thought had been gradually formed, in which Mao Zedong summed up the lessons of the three Leftism errors within the Party, particularly the serious dogmatism errors made by Wang Ming. It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on the basis of summary by re-reviewing and re-recognizing the Leftism errors or lessons occurred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d by the Party. After criticizing and reflecting the subjectivism of Leftism errors, Mao Zedong 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fter reflecting and summing up the Leftism error of urban centralism, he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rural-centered revolutionary path. After reflecting and summing up the Leftism error that excluded the middle class from the united front, he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aximizing allied forces. After criticizing and reflecting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e proposed the theory of correctly handling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Party. All the above shows that Marxist theory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dogmatism to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Mao Zedong; democratic revolution; Leftism;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7页。